

《三国志·高句丽传》 研究

朴灿奎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韩国学术振兴财团资助出版

《三国志·高句丽传》研究

朴灿奎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三国志·高句丽传》研究

著 者	朴灿奎		
责任编辑	贾淑文	崔玉金	封面设计 万 革
责任校对	巩忠坚		版式设计 刘万革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长春市正泰印务公司
印 刷 者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2730-X/K·132
定 价	18.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序 言

长期以来，由于高句丽文献史料的贫乏，给研究带来巨大困难，使很多问题一时难于澄清。当然进一步发现新史料，能有助于高句丽史研究的进展；但对新史料的发现不可能抱奢望，基点还应放在对已有史料的考订、理解上。事实上，这方面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本书作者认清了这点，下决心花大功夫，对《三国志·高句丽传》作了认真、深入、全面的研究，是近年难得的一本研究高句丽史的专著。作者一反某些学者为了某种政治目的，不顾史料，信口雌黄的做法，而是认真从分析历史史料下手。这种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是值得肯定的。相信坚持下去，一定能在考订传统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以促进高句丽史研究的发展。

拜读了本书后，我又深切感知到作者的创新意识。作者在传统史料中认真挖掘，提出了很多与前人不同的观点，这种努力是值得赞赏的。学术研究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有创新。长期以来有不少论著，人云亦云，照抄照转，甚至形成一种错误论调，什么“千古文章一大抄”，这种学术风气是没有前途的。重复前人的作品是经不起历史筛选的，必然会被历史巨浪淘净。创新当然不能保证都正确，都站得住。但即使错误的创新，也比正确的重复强，因为他提出了新的问题，不同意见，促进人们更多地思考问题，使人们的认识得以前进。当然，每个学者都希望自己的创建是正确的，最后为学术界所公认。这就要求自己的创建必须有充足的根据，经得起多方面的论证，要站得住、驳不倒，这就必须充分了解前人观点之误，必须充分论证本人观点之正确。提出新见解，而没有充足根据是站不住的，有时所提新见解，虽有一定根据，但并不充足，并不能排除其他各种论点。这时自己的新见解就往往只是众多假说中之一个，而不是定论。这就要求学者既要在自己有一定理由时，敢于

大胆坚持己见，又要在自己理由站不住时，敢于大胆修正己见。

百家争鸣是促进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要动力。任何学者都应大胆提出自己的学术假设，在百家争鸣中经受不同意见长期争论的考验。经过长期百家争鸣，自己观点站得住，驳不倒，最后就为学术界公认成为学术界的定论。或者经过百家争鸣，发现自己的论点依据的不足，就在吸收他人优点基础上，自己不断补充、修改、发展自己的观点。学者在争取创新时要“存同求异”，不苟同前人之见，提出自己不同看法。而在学术争论中，则要“求同存异”。逐步使争论各方在一些观点上取得共识，缩小分歧，争论才能不断前进。

本书作者的大胆创新我是赞赏的，但还要在百家争鸣中不断丰富、修订、发展自己的论点，使自己更上一层楼，不断向“绝对真理”迈进。

孙进己

2000年5月26日 于沈阳

目 录

序 言	(1)
绪 论	(1)
第一章 王莽朝记事考	(13)
第一节 有关王莽朝高句丽记事的诸史料辨析	(14)
第二节 高句丽侯騊考	(26)
一、句丽胡与高句丽县	(27)
二、沸流国与高句丽侯	(33)
第二章 小水貊与梁貊关系考	(40)
第一节 小水貊的地理位置和活动时限	(41)
一、关于小水貊的史料记载分析	(41)
二、小水貊的考古遗迹考查	(49)
第二节 梁貊的地理位置和活动时限考	(52)
一、梁貊的地理位置考	(53)
二、梁貊的存续时限及与高句丽的关系	(61)
第三章 初期高句丽之五部考	(64)
第一节 高句丽之五族考	(65)
一、高句丽五族考	(65)
第二节 初期高句丽的五部考	(71)
一、高句丽五部的名称	(71)
二、五部是五族发展和演变的结果	(76)
三、高句丽五部的形成时间	(77)
第三节 涓奴部与桂娄部的王位交替	(79)
一、桂娄部的形成和与涓奴部的王位交替	(80)

二、关于太祖王时期和伊夷模时期交替说的辨析	(84)
第四章 初期高句丽之王系考	(88)
第一节 宫、伯固考	(89)
一、宫的在位时间、谥号及姓氏考	(89)
二、伯固的在位时间和辈分考	(97)
第二节 故国川王与拔奇考	(101)
一、故国川王存否考	(102)
二、拔奇乃发歧之误	(106)
第五章 高句丽“下户”性质考	(113)
第一节 《三国志·东夷传》中的“下户”	(113)
一、夫馀、韩、涉、倭的“下户”	(114)
二、高句丽“下户”的构成	(117)
第二节 高句丽之“下户”的性质	(119)
一、被征服地区的“下户”性质	(119)
二、高句丽五部内的“下户”性质	(123)
第六章 《三国志·高句丽传》译注文	(126)
附录	
一、史料摘抄	(148)
二、中国两汉魏纪元表	(171)
三、主要参引文献及论著目录	(173)
后记	(185)

绪 论

在初期高句丽史研究中^①，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是有关文献记载的稀少和相互之间差异点甚多的问题。这一问题使初期高句丽史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内外史学界众多争议的焦点。这些争议，有一些是错误理解史料记载原意的结果，另有一些则是随着研究者们在其研究中各自偏重于某一种文献的记载，而得出各自相异结论的结果。这种情况，实际上意味着在目前要促进早期高句丽史的研究，一种对文献记载的综合性的、深入的和比较专门化的探讨是必须的。本文写作就是在这种考虑下着手进行的。

关于高句丽的历史，历代中国正史均有所载。其中，关于初期高句丽的记载，论其成书年代和记载内容，《三国志·高句丽传》无疑是最具重要性的文献记载。现今史学界在初期高句丽史研究中存在的各种争议，追溯其源，可以说有不少是与如何理解此传的记载有关。

本文试图在吸取前人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三国志·高句丽传》与其它文献记载的比较分析，结合我国近年来取得的新的考古发掘成果，对现今史学界在理解《三国志·高句丽传》的记载时，仍有争议的几个问题，提出笔者的一些不成熟观点。笔者认为，本文如果还多少有其意义的话，这个意义不仅在于笔者所提出的粗浅的观点，我所希望的本文所具有的另一个意义是能有助于读者对《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史料价值有个客观公正的认识。

一、陈寿的《三国志》和其《高句丽传》的史料价值

陈寿与《三国志》。关于陈寿的生平及其活动，《晋书·陈寿传》中

^① 因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三国志·高句丽传》，故本文所言之初期高句丽含义的下限，截止为《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所载之东川王位宫在位时期。

有较详细的记载^①。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市）人。生于三国蜀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据此可以看出陈寿的青壮年时代，恰值魏吴蜀三国鼎立的三国时代。西晋统一三国则是陈寿48岁的时候。陈寿少好学，曾是当时著名古史学家谯周的弟子^②。后来，在蜀国做过观阁令使。蜀亡以后，在晋朝作过佐著书郎、著书郎、治书侍御史等官。他一生的主要著述，除《三国志》外，还有《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古国志》五十篇、《益部耆旧传》十篇。

《三国志》由《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部分组成，共六十五卷。曹丕篡汉建魏，蜀吴亦相继称帝。陈寿从历史实际出发，用“三国”命名，并分国编撰，来记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在纪传体断代史中别创一格。《三国志》实际记载了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三国结束（184年至280年）的将近一百年的历史。

在陈寿撰写《三国志》以前，魏、吴二国均已有史，官修的有王沈《魏书》、韦昭《吴书》，私撰的有鱼豢《魏略》，这些都是陈寿所依据的基本史料。《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前半部分的内容，就是大多引之于《魏略》所载^③。关于《三国志》的成书年代，虽无明确记载，但从所撰之内容来看，应在晋统一三国之后。后人推断，大约在他60岁左右的时候撰成。^④

《三国志》同其它历代正史一样，仍然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记载人物事迹的纪传，其中仅《魏书》中有一卷记载当时东北诸民族概况的《乌桓鲜卑东夷传》。《三国志》之所以成为高句丽史研究的最重要史料之一，就是因为有此一传。

在高句丽史的研究中，《三国志》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高句丽传中，其毋丘俭传、公孙度传、涉传、沃沮传、夫馀传等其它传记，亦在初期高句丽史研究中，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① 《晋书·陈寿列传》。

② 《三国志·蜀书·谯周传》。

③ 全海宗：《东夷传的文献研究——魏略·三国志·后汉书·东夷关系记事的检讨》，（韩）一潮阁，1980年版。

④ 赵淡元：《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上，第162~16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

《三国志》不同于《史记》、《汉书》等前史,虽言志,实无一志。仅有记载人物事迹的纪传,而无表、志,这不能不成为《三国志》的一大缺陷。

《三国志》有取材精审的优点,但又有过于简略之缺点。正如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言:“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在二十五史中,《三国志》最为简洁。历代史家都欣赏他的史笔,又均对其过于求简而常有失漏感到遗憾。裴松之受南朝宋文帝之命为《三国志》作了注,从而弥补了这一缺陷。裴松之在为《三国志》撰注时确定了有别于其它一般注书重在字句音义及名物制度的诠释的惯例,着重进行了对其内容的增补和考订。陈寿撰《三国志》的时候,由于时代隔得太近,有关三国的历史著作,不是看不到,就是尚未编写出来。到了南北朝时,有关三国的历史著作开始大量涌现出来。裴松之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材料作为注释《三国志》之用。他所引魏晋人的著述多达156种,从而为后人保存了大量文献资料。其注文多于原文三倍,很多《三国志》失载的重要史实都保存于裴松之的注文中^①。遗憾的是在东夷传中,裴松之仅对夫馀和三韩传进行了一些补注,对高句丽、沃沮和涉传,则未补片言注语,从而使裴注对我们研究初期高句丽史无多大帮助。

清代研究《三国志》及裴注者很多^②,其中以清人杭世骏的《三国志注补》和梁章巨的《三国志旁证》为优。近人卢弼汇集历代学者对《三国志》与裴注的研究成果,并间下己意,撰成《三国志集解》,是阅读《三国志》的重要参考书。其高句丽传之部分,亦有不少注解文,虽不能作为史料来引用其文,但对理解《三国志》高句丽传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史料价值。关于早期高句丽史的文献资料寥寥

① 杨家骆主编:《新校本三国志附索引》第8页(台湾鼎文书局);张传玺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简明教程》第154~155页。

② ①清·洪亮吉撰:《补三国疆域志》。

②清·万斯同撰:《三国年表》。

③清·洪飴孙撰:《三国职官表》。

④清·陶元珍撰:《补三国食货志》。

⑤清·钱大昭、侯康撰:《补三国艺文志》。

⑥清·杭世骏撰:《三国志注补》。

⑦清·梁章巨撰:《三国志旁证》。

无几。现存较全面记述初期高句丽史的文献资料,比较有价值的仅有《汉书》、《三国志》、《后汉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此外,尚有一些相关记载,零星散见于其它一些史书中。魏晋时期以后撰写的我国正史中亦有一些关于早期高句丽的记载,但多系抄系前书,无多大史料价值。

仅就我国正史来说,《三国志·高句丽传》无疑是最具史料价值的历史传记。《三国志》高句丽传虽篇幅偏少,但其在初期高句丽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之重要性,可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相媲美。

首先,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内容上看,此传对早期高句丽的政治、经济、风俗、疆域及对外关系等情况进行了全面介绍。综观陈寿《三国志·高句丽传》,大致可分前后两个部分。一是全面叙述高句丽地理位置及社会、文化、风俗、政治制度等概况的带有民族志性质的前半部分。这一部分记载大多同鱼豢之《魏略》的顺序、内容及文句基本相似。可见,《三国志·高句丽传》或是转承鱼豢之《魏略》,或是两书共同承袭了两书之前的同一本史书记载。这一部分的内容,对我们研究建国前的高句丽或建国初期的高句丽历史,无疑是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记载。此前半部分的大部分内容《三国史记》所无,把此部分记载称之为全面介绍早期高句丽之概况的惟一史料亦不为过。二是叙述高句丽和中国新汉魏等中国历代中央王朝之间关系的后半部分。这一后半部分记载中,关于王莽朝的高句丽记事,系转承《汉书·王莽传》中的高句丽记事。陈寿在转录此记载时,基本遵从了班固的原文,但把此记事转录到高句丽传中,无疑是个值得商榷的做法^①。其后的关于历代高句丽王同汉魏关系的记载,系《三国志·高句丽传》所首次记载,无疑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但此部分亦有一些漏载和误载之处。所以在引用其记载时,需与其它史料结合起来进

^① 记载高句丽同王莽新朝之间矛盾冲突的王莽朝记事,最早载于《汉书》。后来,陈寿把此记事第一次载入《三国志》的高句丽传中,从而第一次把此记事与朱蒙所建的高句丽国联系在一起,再后则由范曄把此记事载入《后汉书》的高句丽传中,并进行了一些增删。

笔者认为,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提到高句丽时,并未确言是朱蒙所建的高句丽国。在理解此高句丽时,尚不能排除此高句丽是指汉玄菟郡内高句丽县的可能性。陈寿把此内容转载于《三国志·高句丽传》之中的做法是否正确,值得商榷。其后的范曄在《后汉书》中,对该记事进行了大量增删和修改。在研究此记事时,究竟是遵从《汉书》的记载,还是《三国志》或《后汉书》的记载,无疑是在研究早期高句丽历史时需谨慎对待的一个课题。

行考辨,慎重对待。从这一点上来讲,此部分记载的史料价值不应予以过高的评价。

其次,从《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叙述方式来看,有别于《三国志》的其它传记仅局限于三国时期的断代史体系,采用了《史记》式的通史方式。其书虽取《三国志》之名,但其含高句丽传在内的东夷传之记述,远远超出了三国时期的范围,而可上溯到汉前时期^①。很自然,其史料价值亦远远超出了三国时期。这种叙述方式,无疑对我们研究建国前和建国初期的高句丽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三国志》首次为高句丽单独立了传,是全面介绍有关高句丽概况的历史记载。后来的历代正史对初期高句丽的描述,均承袭了《三国志·高句丽传》,这一点是其它任何史书所不能替代的。

最后、从《三国志》的撰写时间上来看,比起《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朝鲜方面的史书要早得多,甚至于比起从正史的排列顺序上前于《三国志》的《后汉书》,也要早150年左右。《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分别撰成于12世纪中期和13世纪,是对一千多年前历史的叙述。不能排除其所依据的史料在如此长时间传承过程中,出现一些曲笔和遗漏的可能性。所以,仅从距当时的历史事件最近的一点来说,《三国志》的史料价值,亦应予以高度评价。

当然,《三国志·高句丽传》除具有上述应予以肯定的史料价值外,亦有其自身的缺点和局限性。任何一种史书所阐述内容与其实际历史事件发生场所之间的距离和时间,无疑是判定该书史料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②。若谈到《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局限性,首先需提到的是其高句丽传仅是《三国志》之外夷传的一部分,是中原史家笔下的“外夷”历史。从这一点上来讲,与《三国史记》比较,《三国志·高句丽传》有相对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在评估《三国志·高句丽传》时,不能过分拔高其史料价值,并以此传作为标准,去判定《三国史记》等的历史记载

① 金日出(音译):《陈寿的三国志和其高句丽传的史料价值》,《历史科学》1957年第3期,第36页。

② 今井登喜著,姜奉远译:《历史学研究法》第58页,民族文化社,1985年9月版。

正确与否。另外,《三国志·高句丽传》作为外夷传的一部分,没有也不可能更改金富轼所言的历代中国正史所共有的“内详而外略”的记述体系^①。所以,陈寿之《三国志·高句丽传》记述得非常概略,加上陈寿之叙述求简的编撰风格,无疑使《三国志·高句丽传》带有过于简略的缺憾,纵观其全文似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在这一点上,《三国史记》的记载,无疑要比《三国志·高句丽传》详细得多。《三国志·高句丽传》的这种过于求简的叙述风格,无疑增加了后人理解其传的难度。

二、研究概况与研究方法

研究概况。对《三国志·高句丽传》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初期高句丽史的全面研究。因为其传本身就是全面反映高句丽初期历史的文献记载。长期以来,围绕着如何理解《三国志·高句丽传》的记载,史界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争论。这种探讨,基本上是通过与《三国史记》等其它史书的比较研究和借助考古研究成果,而得到了进行,其争论也多与如何对待《三国志·高句丽传》的记载有关。综观学界对《三国志·高句丽传》的研究,依据其研究方法,可分为以下三大类。

一是对历代中国正史中有关初期高句丽史文献资料的排列对比研究。据笔者所知,迄今为止,采用这种方法研究《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学者不多,仅有韩国的全海宗和朴性凤等人。全海宗的《东夷传的文献研究》^②,主要通过对《魏略》、《三国志》、《后汉书》的东夷传之比较研究,着眼于这些史书之史料价值的综合评价。朴性凤的《东夷传高句丽关系资料》^③,则对历代中国正史中有关高句丽的记事,予以了整理和对比研究。这些研究,无疑是一项研究《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基础性工作。但由于这种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对历代中国正史中有关高句丽

^① 金富轼:《进三国史记表》,转引自李丙焘译注:《三国史记》上,第14~15页,(韩)乙酉文化社,1996年7月版。

^② 《三国志·蜀书·遯周传》卷四十二。

^③ 朴性凤:《东夷传高句丽关系资料》,(韩)高丽大学校传统文化研究所,1981年版。

记事的比较研究,而未与像《三国史记》这样的史书记载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使这些研究对《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史料价值评价,仅限于中国正史的范围内。而要想对《三国志·高句丽传》史料价值作出客观、公正和全面的评价,则不应仅看此传与其它历代中国正史的高句丽传相比,有哪些特点和优点,还应看此传与《三国史记》等有关的史书相比,有什么特点和优势。

二是对《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分段性研究,即对《三国志·高句丽传》中的部分内容的分段研究。当今史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属于这一类的范围。如对初期高句丽官制、初期高句丽王系、初期高句丽风俗习惯和小水貊、五部、下户等问题的研究^①,均可以说是属于这一类的研究范围。这种研究,无疑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三国志·高句丽传》的记载,不失为搞清初期高句丽历史真貌之良法。但仅凭对此传个别内容的研究,尚难以对此传之整体记载的史料价值作出全面综合性的评价。

三是对《三国志·高句丽传》全文的考释性研究。据笔者所知,依此种方法对《三国志·高句丽传》进行研究的文章,仅有顾铭学的《魏志高句丽传考释》一文^②。此文采取了分段考释《三国志·高句丽传》

① 关于史学界对小水貊及初期高句丽王系、五部、下户等问题的研究情况,本文之第一至第五章中均有较详记述,在此省略。对初期高句丽官制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研究情况,则可参阅以下论文。

① 李殿福:《高句丽民族的宗教信仰》,《北方民族》,1990年2期。

② 朝鲜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高句丽文化》,1975年。

③ 余昊奎:《高句丽初期郡部统治体制的成立和发展》,《韩国史论》27,1992年。

④ 金哲埃:《高句丽、新罗官阶组织的成立过程》,《李丙燕花甲纪念论丛》。

⑤ 武田辛南:《高句丽官位制とその展开》,《朝鲜学报》86,1978年。

⑥ 琴京淑:《高句丽初期的中央政治组织》,《韩国史研究》86,1994年。

⑦ 林起煥:《高句丽集权体制成立过程的研究》,1995年,庆熙大博士学位论文。

⑧ 卢太敦:《关于高句丽初期娶嫂婚的一考察》,《金哲埃博士花甲纪念史学论丛》,1983年。

⑨ 方起东:《高句丽墓制和葬俗》,《高句丽文化国际学术会论文集》,海外韩民族研究所,1994年。

⑩ 李龙范:《关于高句丽人的鸟羽插冠》,《东国史学》4,东国大学,1956年。

② 顾铭学:《魏志高句丽传考释》上、下,《学术研究从刊》1983年第1~2期,第9~16页;1983年第4期,第9~16页。

全文的方法，对如何理解此传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叙述。顾铭学之此研究办法，笔者甚以为然。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有助于我们对《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史料价值，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评估，进而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惟欲深入研究和考辨，以其单篇论文之形式，尚有受篇幅所限之憾。

研究方法。鉴于《三国志·高句丽传》是个全面反映初期高句丽史文献资料，加上初期高句丽研究本身所带有的复杂性，本文不可能对《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全文，均进行全面、详细和深入的考证和解释。本文拟以现今学术界在引用和理解《三国志·高句丽传》的记载时，仍具有较大争论性的几条记载为重点考辨对象而予以研究。并通过《三国志·高句丽传》和其它史料的比较研究，判明《三国志·高句丽传》记载内容的正误，进而对《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史料价值作出评价。在本研究中，笔者拟以《后汉书》高句丽传和《三国史记》为主要比较研究对象，并部分附加与《汉书》等其它文献资料的比较。此外，对《三国志·高句丽传》中关于小水貊的记载，则在上述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一些近年来我国考古学界取得的部分发掘新成果进行了考察。

为了便于本文所要进行的对《三国志·高句丽传》与其它史书记载的比较研究，在此先简要介绍一下《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史记》有关高句丽的记述。

《汉书》由东汉之班固所撰。从撰写时间来看，《汉书》是最早记录高句丽的史书。《汉书》的作者班固，开始撰写《汉书》是东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死于狱中。《汉书》的编写工作实际上至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已基本完成。仅有《八表》和《天文志》是由其妹班昭等人补撰。《汉书》虽没有为高句丽单独立传，但其地理志中关于汉玄菟郡的变迁和王莽传中关于高句丽的记事，无疑对我们理解《三国志·高句丽传》中的相关记载有很大的帮助。

范曄的《后汉书》虽然从历代正史的顺序来看是早于《三国志》的史书，但实际撰写时间要比《三国志》晚150年左右。其东夷传的高句丽部分，仅后汉末对汉关系部分有所补充外，基本上系承袭《三国志》

·高句丽传》所载。文中虽可看出其重新整理修正的意图,但大多根据自己的判断,而对其内容有所增加和补充,并在记述方式上予以了再整理。这种再整理造成了《三国志》和《后汉书》的高句丽传在内容上存在不少差异点,从而使后人在引用这些史料时出现混乱和争议。范晔对《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再整理,似乎是犯了误导后人错误理解前史的错误,从而降低了《后汉书·高句丽传》的史料价值。对《后汉书》史料价值的整体评价,笔者不敢妄下评语,惟其高句丽传部分,除了新增补的后汉与高句丽关系的记载外,可以说是没有多大史料价值^①后人对初期高句丽的错误理解,有不少是源于偏信《后汉书》记载。

《三国史记》成书于12世纪中叶,是金富轼受高丽仁宗之命,仿《史记》等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叙述形式撰成。有本纪28卷、年表3卷、志9卷、列传10卷,共50卷。其中,13卷至22卷为高句丽本纪。金富轼在撰写《三国史记》时,所参考的基本史料可分三部分。一是《旧三国史》,二是各种古记,三是历代中国正史。

从李奎报的《东明王篇序》关于“得旧三国史,见东明王本纪……金公富轼重撰国史,颇略其是云云”的记载中可以看出^②,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之前,已有了《旧三国史》。虽然现今难以判定此书的撰者和成书年代,但不难推测出金富轼在编撰《三国史记》时,参阅了《旧三国史》的记载内容和体裁。

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婴阳王十一年条关于“诏大学博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集五卷。国初始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至是删修”的记载来看^③,高句丽在“国初”就有名曰“留记”的百卷史书,至婴阳王时又删修成新集五卷。从《三国史记》的各类注文中可以看出,金富轼所参用的史料可能是“海东古记”、“三韩古记”、“新罗古记”等各种“古记”^④。当然,流传至当时的这些“古记”,亦

① 全海宗:《东夷传的文献研究—魏略·三国志·后汉书·东夷关系记事的检讨》,第146页,(韩)一潮阁,1980年7月版。

② 李丙焘译注:《三国史记》上,第14页,乙酉文化社,1996年版。

③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八》婴阳王十一年条。

④ 李康来著:《三国史记典故论》,第113~149页,民族社,1996年版。

有可能在长时期的传承过程中经过了后人的部分润色和加工。但是，从这些“古记”中有关高句丽的记载是源于高句丽人自己的传承的一点上来讲，其史料价值，无疑应受到高度评价。

金富轼在撰写《三国史记》时，还大量引用了我国正史的相关记载，并把这些记载穿插到高句丽本纪的各个时期中。而在这个引用过程中，有一些内容是由于金富轼的误解和不慎，出现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可见，《三国史记》的成书时间虽然晚于《三国志》，但其高句丽本纪是有关高句丽的各种史书记载之集大成。所以在初期高句丽史研究中，要克服《三国志·高句丽传》过于简略的不足，需参考《三国史记》的记载，进行比较分析和归纳。

三、主要内容

本文除绪言和附录外，正文共分六章。前五章就现今学界引用《三国志·高句丽传》的记载时，错误理解的部分和仍具争论性的内容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六章则是笔者对《三国志·高句丽传》的注译文。每章的内容可概括如下：

第一章：王莽朝高句丽记事考。本章考察了《三国志·高句丽传》的王莽朝记事，对在学界似已成定论的把王莽朝高句丽记事中的高句丽，看成是朱蒙所建高句丽国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在本章之第一节里，通过把此记事与《汉书》和《后汉书》的相关记载进行对比分析和考察，论证了《三国志·高句丽传》中的王莽朝记事，与朱蒙所建之高句丽国无关，是记载玄菟高句丽县之高句丽人与王莽新朝之间矛盾冲突的记载；王莽更名不是更朱蒙所建之高句丽为下句丽，而是更高句丽县为下句丽县。第二节通过对汉高句丽县的特殊统治方式的考察和对沸流国位置及其国王松让的考察，论证了《三国志》所言的高句丽侯驹，就是多勿侯松让的结论。通过上述考证，本章得出了陈寿把《汉书》之王莽朝高句丽记事，转载于《三国志·高句丽传》是个错误，此错误导至后人把此记事看成是“塞外”之高句丽国。

第二章：小水貊与梁貊关系考。本章通过考察小水貊和梁貊的地理位置和活动时限，对主张小水貊就是朱蒙所建之高句丽国之前身的观